



丽泽社会学文库

丛书主编 / 张兆曙

丛书副主编 / 林晓珊

农民日常生活中的 城乡关系

张兆曙 / 著

NONGMIN RICHANG SHENGHUO ZHONG DE
CHENGXIANG GUANXI

上海三联书店

丽泽社会学文库

丛书主编 / 张兆曙

丛书副主编 / 林晓珊

农民日常生活中的 城乡关系

张兆曙 / 著

NONGMIN RICHANG SHENGHUO ZHONG DE
CHENGXIANG GUANXI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城乡关系/张兆曙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8. 1

ISBN 978-7-5426-6158-6

I. ①农… II. ①张… III. ①城乡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C9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2292 号

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城乡关系

著 者 / 张兆曙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8.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158-6/C·569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本书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SH016）
暨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09CGSH001Z）的资助

总序

出版一套文库或丛书，总要在冠名上思量一番，以表达特定的意义或寄托特别的期许，丽泽社会学文库自然难以例外。“丽泽”一词，沿自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丽泽书院，亦谓丽泽堂、丽泽书堂，乃南宋大儒吕祖谦讲学论道之塾所，设于宋乾道初年，其址位于古婺州（今金华市）光孝观侧。以“丽泽”命名这套丛书，一则希望藉此沾染一缕丽泽书院千年文脉的氤氲馨香，一则期冀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能够在承继西学源流基础上接续中国文化传统。“丽泽”之名取于《周易》，意为两泽相连，喻指君朋同道会聚切磋、砥砺思想、探索新知有如两水交融、脉脉相关。丽泽社会学文库这一冠名所寄寓的要义和宏旨即在于此。

这套文库的作者皆为浙江师范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青年教师。提起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版图，首先想到的不外乎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等诸多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城市以及一千“985”或“211”重点高校。即便在许多省会城市的大学，社会学的学科规模也大都比较小，学科发展相对缓慢，很难形成气候。因此，对于偏隅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来说，社会学发展的所有内部和外部条件几乎都不具备。机缘巧合，2000年浙江师大联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申报社会学二级学科硕士点获得批准。却因缺乏足够的专业师资，直到2003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在

本校的导师队伍中(当时有两位校外导师王金玲教授和杨建华教授),除卢福营教授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可归属社会学范畴之外,其他导师基本上都是哲学出身。这种依靠整合相关资源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结构,一直维持到2009年左右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学科结构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班出身的年轻教师不断加入和持续成长,二是非专业教师的逐渐退出。2002年,省教育厅批准浙江师大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基于本科教育和硕士点建设对专业教师的双重需求,学校开始陆续引进了10多位年轻的专业教师。由于硕士点的师资不足,大部分年轻教师在尚未取得高级职称的情况下,提前参与了硕士生的教学和论文指导工作,客观上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一个“倒逼”作用。2009年,社会学学科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省教育厅给浙江师大分配了2个浙江“十一五”省级重点学科的增列指标。经多方争取和博弈,社会学幸运地获得1个指标,但前提是学科成员不能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复。至此,社会学意外地跨进了省级重点学科的行列,但创建社会学硕士点之初的那一批非专业教师已经退出这支队伍,形成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变化提升了浙江师大社会学的专业化程度,但毕竟是一支年轻得几乎无法看见预期的学科队伍。浙江师大社会学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完全无法想象。2010年,学科负责人卢福营教授调离本校,社会学的学科队伍变得更加年轻。绝大多数学科成员都是80后,他们要么刚刚博士毕业,要么还处于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阶段。而我,也仅仅因为稍资年长而被推到学科负责人的职位上。我是一个喜欢闲云野鹤的人。在此之前,曾被选举为社会工作系系主任,负责本科生的教学工作。由于不适应组织内部的表格治理,干了一年半之后即坚定地辞去了系主任职务。孰

料,3年之后却要负责一个责任更大的省级重点学科平台和学位点建设。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生态中,“混”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存策略。对于远离大都市和非重点大学的青年教师来说,混混日子其实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只要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凑齐职称所要求的科研任务,完全能够过上一种大都市和重点大学难以实现的惬意生活。然而,形格势禁的竞争机制使得“惬意”成为一种奢望。省级重点学科平台每五年要重新评定一次,学科评定的指标如果没有比较优势和增量,就会在下一轮的评定中被淘汰出局,成为学科竞赛的失败者。堪称“特色”的是,中国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有一个特点,即行政力量的参与和“护驾”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那些发展较好的学科往往都是某位校领导、院领导或部门领导负责的学科。对一个“无帽”且性喜恬淡之人,让其肩负学科竞赛的重任,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令人欣喜的是,年轻教师强烈的发展欲望为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这批怀揣学术理想刚刚博士毕业或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和面临着一个自我提升的瓶颈,倘若不能突破,可能就此平庸下去,沦入“混”的生存状态。经过大家的反复动议,从2010年9月开始,我们在学科内部组织了一个“双周学术交流坊”,旨在通过学科内部的深度交流促进和提高学术水平。一般情况下,如果学科成员完成了自己比较看重的论文,都会先在“双周学术交流坊”上报告一次,大家围绕论文进行讨论交流和批评回应,然后经选择性的借鉴和修改之后,再对外投稿。按照最初的设想,学科内部的交流活动每两周举行一次。由于密度太大,后来改为一个月左右举行一次。坚持到现在,大概已经举行过接近50次这种形式的内部交流。“双周学术交流坊”已然成为浙江师大一抹亮色。

学科内部的深度交流和切磋共进逐渐成为浙江师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提高了年轻教师的学术水平,并直接体现在论文发表上。在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学科成员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几乎都经过了“双周学术交流坊”的讨论。二是促进了学科团队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年轻的学科成员大都很享受这种深度交流和切磋共进的形式,大家都很关心下一次工作坊是什么时候,或者主动提出讨论自己的文章。学科成员在开展内部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轻松、坦诚和友好的学术氛围和人际关系,完全没有那种同行相轻和相互妒忌的单位人格。正是在这种良性的团队氛围中,浙江师大社会学学科尽管年轻,但仍然冒出不少引起学界关注的青年俊才。刘成斌调往华中科技大学工作之后,已经就任社会学院的副院长;林晓珊则是社会学界最年轻的80后教授之一,并担任浙江师大法政学院的副院长;陈占江在环境社会学和费孝通思想研究两个领域已经被学界广为关注;李棉管最近两年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发展势头也十分强劲;方劲、许涛、袁松和辛允星等正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学科正在耐心地静待花开。总体上看,在这个学科团队里面,大概每隔两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冒出一位令人刮目的学术新人,惹得许多兄弟院校十分“眼红”。

《周易》有云:“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很难说,这一群居住在丽泽花园(即浙江师大家属区)的年轻学者感受和继承了丽泽诸儒的“兑”学之精神,但深度交流和切磋共进确实已经成为浙江师大社会学的一种品格。近几年,浙江师大社会学取得的主要进步都与大家的相互促进是分不开的。尽管这套文库中6部著作的选题不同,风格各异,方法有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每一部著作的核心内容在成文发表的过程中,都经过了“双周学术交流坊”的充分讨论和思想碰撞。千年前“闻善相告,闻过

相警，患难相恤，游居必以齿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尔汝”的丽泽遗风悄然吹进浙江师大社会学每一位成员的心灵。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这种“丽泽互通、学问相兑”的团队品格也许更为重要。

是为序。

张兆曙

2016年8月

目 录

导论 作为“中国问题”的城乡关系	001
------------------------	-----

第一章 城乡关系的文献考察与研究设想	008
--------------------------	-----

- 一、城乡关系研究述要 / 008
 - (一) 从“空间问题”到“发展问题” / 008
 - (二) “宏观结构范式”与“整体进程范式” / 016
- 二、研究设想 / 022
 - (一) 研究视角：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出发 / 022
 - (二) 观察主线：农民的日常生产与日常消费 / 026
 - (三) 研究框架：城乡关系的空间梯度 / 030

第二章 紧密结合型城乡关系	035
---------------------	-----

- 一、印象溪郊 / 035
- 二、溪郊农民的日常生活 / 039
 - (一) 时空格局：进城日常化和全员进城 / 040
 - (二) 时间的错位搭配：盘活“闲不住”劳动力 / 044
- 三、无缝对接的市场结构 / 048
 - (一) 日常生产的市场结构 / 048
 - (二) 日常消费的市场结构 / 052

四、无中介的市场地位及其表现 / 055

(一) 溪郊农民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 056

(二) 溪郊农民的市场意识 / 061

五、溪郊农民的市场策略及其行动逻辑 / 066

(一) 市场话语与辅助性行动 / 067

(二) 市场技术 / 072

第三章 分离便通型城乡关系 079

一、走进辛庄 / 079

二、辛庄农民的日常生活 / 083

(一) 辛庄农业：农业机械对人力的释放 / 083

(二) 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兼业者 / 088

(三) 跨地区的常年外出务工者 / 091

三、城乡分离的市场结构 / 095

(一) 日常生产市场的“中介性”结构 / 096

(二) 日常消费市场的“经销/代理”结构 / 101

四、双重市场结构中的市场地位 / 105

(一) 受制于中介的生产地位和分层次的消费地位 / 106

(二) “力不随心”的市场意识 / 113

五、辛庄农民的市场策略 / 120

(一) 农产品交易中的回旋空间及其策略 / 120

(二) 辛庄村民的家计选择及其策略 / 124

第四章 空间隔离型城乡关系 129

一、翻山越岭访垭坪 / 129

二、山里人家的劳作与生计 / 133

(一) 大山的“馈赠”与“庇护” / 134

(二) 大山的“束缚”与“限制” / 139

(三) “下山”与“进城” / 143

三、市场末梢的垭坪村及其日常生活 / 147

(一) 日常生产的市场结构 / 148

(二) 日常消费的市场结构 / 157

四、边缘化的市场地位 / 164

(一) 临时与游离：垭坪村民在 K 县劳动力市场上的
一种常态 / 164

(二) 宰制与贱卖：垭坪村的农产品进城 / 169

(三) 成本性排斥：垭坪村民的消费地位 / 173

五、垭坪村民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行为 / 177

(一) 粗略的经济核算 / 178

(二) 迟钝的商品意识 / 184

第五章 城乡关系的空间类型学及其意义表达 191

一、城乡关系的类型比较 / 191

(一) 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 / 191

(二) 市场结构与市场地位 / 197

(三) 农民的市场能力：市场意识与市场行为 / 202

二、城乡关系的“中间地带” / 209

(一) 城乡关系的过度简化与两个被忽视的事实 / 210

(二) “中间地带”的发现 / 213

(三) “中间地带”的市场消耗与市场落差 / 216

三、“中间地带”的结构性特征 / 218

(一) 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 / 218

(二) 充当行政壁垒的着力点 / 221

四、“中间地带”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 223

(一) “中间地带”的“双重扩差机制” / 223	
(二) “中间地带”与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 / 227	
五、空间梯度与政策选择 / 229	
(一) 从空间梯度出发的政策差序 / 230	
(二) 政策结构的空间差异 / 234	
第六章 空间梯度与农户增收的一个模型	242
一、理论基设与分析框架 / 243	
(一) 农民收入的空间关系命题 / 244	
(二) 城乡关系的空间类型命题 / 247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249	
(一) 农户增收的非农化机制 / 250	
(二) 农户增收的人力资本机制 / 251	
(三) 农户增收的社会网络机制 / 252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 254	
(一) 数据来源 / 254	
(二) 变量操作化 / 255	
(三) 研究方法 / 260	
四、模型与结果 / 261	
五、结论与讨论 / 268	
参考文献 / 271	

导论 作为“中国问题” 的城乡关系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是正在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重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亨廷顿，1989：66）。当下中国社会所暴露的诸多重大问题都与城乡差距有关。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马克思、恩格斯，1972：123）。那么，城乡关系毫无疑问构成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发展议题”，议题的核心则是居高不下的城乡差距。然而，从空间的意义上讲，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城乡二分格局”，并不必然成为一个“问题”。城乡关系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成为一个“中国问题”，实际上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罗兹曼在考察中国近代城乡关系时认为，中国城市没有变成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从前现代城乡协调交换的观点看，中国就是一种稳定的样板。城乡之间被一条鸿沟截然划开的问题，并未变得十分明显。无论是国家，还是既存的精英集团，或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都没有推动城市与其四乡建立起新的关系。城市只在很少几个方面有别于农村，并且，对于穷人来说，农村工资甚至大大高于城市工资（吉尔伯特·罗兹曼，1998：199）。西方

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在放任自流的国家政策下,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差别主要是社会分工使然,工农之间基本上维持了一种市场交换关系,日益壮大的城市经济虽然不断蚕食传统农业,但却始终未将农业置于依附地位。西方的城乡关系进入上世纪之后更加体现为一种单纯的劳动分工,即农业仅仅是一个与工业对峙的产业,其经营方式日渐与现代企业化管理趋同。“农民”这一原本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概念业已在西方消失,城乡两地的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也越来越变得无法辨认(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1991)。

也就是说,自然演化形成的城乡二分格局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历史进程,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其社会发展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城市-乡村”相互疏离的二元模式(田毅鹏,2009)。只有当这种自然演化的城乡二分格局“从最初的‘城市依附乡村’经由‘城乡平等互依’发展到‘乡村依附城市’”时,亦即“城市经济开始越来越成为引导及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张汝立,2003)时,才开始出现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抑制和蚕食,城乡差距及其不平等性由此浮现。不过,这种城乡差距及其不平等性仍然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的城乡差距及其不平等性主要是城市与乡村两种社会生活形态、工业与农业两种产业分工之间自由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人为规划的痕迹并不明显。

然而,当城乡关系的自然分化过程为某种特定的人为规划和制度干预所加固乃至加剧时,城乡差距及其不平等性则会“溢出”经济层面,成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作为当代“中国问题”的城乡关系,就是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乡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范畴的议题,而且成为一种政治社会议题。这就需要提及极具中国色彩的户籍制度和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

从帝国溃败、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内战频仍、兵荒马乱和民不聊生的泥潭中艰难走出来的新政权，出于重建公共秩序的要求，于1950年开始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人口登记与管理制度^①（陆益龙，2002），以确保新兴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到1958年，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已经基本定型。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户籍制度实际上就是对自然人口进行城乡界分、分类控制及迁移管制，并辅之以配套的社会政策，进而确立公共秩序和组织生产。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人为规划“工程”，户籍制度包含着“城市优先”的制度逻辑，即随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城市的安全和稳定对于维护新政权来说就变得异常重要，“建立（城市）公共秩序，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控制失业现象”（泰韦斯，1990：72）事关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户籍制度在服务于这种新政权的特定需要时，同时也为城市人口带来了更多的制度性关怀，并借助单位制的组织形式给予城市人口提供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其他各种生活设施等工资以外的社会福利。而农村人口则只能在农业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组织框架内，依靠劳动所得和集体福利维持生计。国家对城乡人口的差别化对待及其迁移管制，使中国革命所依仗的工农兄弟和劳苦大众被人为地切割为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户籍制度不仅分化了工人和农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而且直接导致其经济地位上的重大差别。

如果说户籍制度体现了一种对农村人的制度性排斥，那么建国之后的工业化战略则是一种对农村的直接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这些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包括《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1950）、《城市户口暂时管理条例》（1950）、《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1953）、《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953）、《内政部、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通告》（1954）、《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1955）、《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1955）、《首次全国户口工作会议的三个文件》（1956）、《户口登记条例》（1958）。

国成立之后,为了避免陷入“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工业”的发展战略。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弱小的民族工业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业积累和健全的产业结构,加之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因而依靠剥夺农业剩余完成工业积累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1991)。其基本的实现形式就是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产品在城乡互通中的“剪刀差”。据估计,在取消统购统销政策之前的30年,“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多达6000亿”(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1991)。考虑到当时的物价指数和收入水平,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剥夺农业剩余并转化为工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农业商品化的萎缩。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这种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尽管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和较稳定的时期,农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7%左右,然而,农产品商品率却呈下降趋势。粮食的净收购额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从1953年的21.5%降到1957年的17.4%,基本上回到1952年的水平。农民通过集市出售的农产品占全部农产品收购额的比重从1952年8%降到1957年的6%。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居民自给部分的消费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人均货币收入仅增加9.7元,而同期城市居民的人均货币收入增长59元(贺晓东:1988)。

户籍制度与工业化战略的双重作用使中国的城乡差距从新中国初期开始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从1952—1977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平均差距系数为2.6左右(其中,1959年和1960年曾发生了较大波动,一度超过3.0),与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相比,几乎要比后者高出1.1—1.5倍。这种城乡差距的高位运行,直到1978年之后才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经济状况得到明显